

一章 阳明“为学之变”

关于王阳明一生的学术经历，有“为学之变”与“为教之变”的说法，其中“龙场悟道”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而“龙场悟道”之前的求索，又素有“为学三变”之论，且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三变”之论，仔细分析下来，则应视为“四变”之说；而反映在《王文成公全书》中《年谱》的记录，似乎又有“五变”之事实。另外，“五溺”的说法也见于湛甘泉^①为阳明所刻之墓志铭。于是，阳明的为学历程到底是“三变”“四变”“五变”还是“五溺”，如今成为大可一论的话题。

一、回顾“三变”说

▲ 黄宗羲的“三变”说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之卷十《姚江学案》中所讲关于阳明为学“三变”的一段话，最为引人注目。梨洲先生曰^②：

先生之说，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梨洲的“三变”之说描述了青年阳明为学的四个时段，即一泛滥于辞章；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三出入于佛老；四居夷处困，即在龙场。四个时段构成了三次变化。第三次变化即“龙场

悟道”，至此其学问“始得其门”。

▲ 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

除了黄梨洲的上述说法，还可从阳明的两位弟子钱德洪和王畿那里分别找到措辞类似但看法迥异的表达。先看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所言：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①

钱德洪的这一说法与黄梨洲的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龙场悟道”为界限。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显然少了一个“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的阶段。既然只有三个时段，德洪所言岂不成了“二变”之论？

▲ 王畿的“三变”论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阳明的另一弟子王畿在《滁阳会语》中的说法：

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其少慕英毅凌迈，超侠不羁。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孙吴，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艰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②

显然，王畿的这一说法是真正的“三变”说：一变是由泛滥于辞章而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二变是由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而究心于佛老之学；三变则由究心于佛老至居夷处困后而恍然神悟。此“三变”说与黄梨洲同。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钱德洪所论，不如王畿与黄梨洲的看法准确。而今人凡举“三变”之说，通列梨洲、德洪、龙溪而不加区别，更有以德洪为引征者，殊不知龙溪之说才是原

① 蔡厚：《王阳明哲学》，三联书店，1971年版。
② 任文利：《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洲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42页。
③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④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创。

不管怎样，“三变论”还是流传开来了。

中国台湾学者蔡仁厚在其《王阳明哲学》一书中有前三变为异质之变、后三变为同质之变的提法^①。任文利在其《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一书中引用梨洲、德洪、王畿“前三变”“后三变”的说法，认为黄宗羲所述阳明思想的演变，乃本于德洪与王畿之说。“其中，两个‘三变’的说法采自钱德洪，但不取其‘学’‘教’之变的区分方法。两个‘三变’的具体内容采自王畿，不过，王畿主‘再变’，并不以‘居越以后’为一变，黄宗羲则以‘居越以后’为一变。”^②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说法并不否认前、后“三变”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德洪前后‘三变’之说易于记诵，故明末以来，影响较大。”^③陈于书中亦对“三变”之说提出了质疑。他在书中提到：“事实上，甘泉所谓‘五溺’而一变至道与德洪‘三变’而至道所说着眼点略异，甘泉的丙寅至道说是对泛滥异学而言的，而德洪的‘龙场悟道说’则是对宋学而言的。钱德洪与王龙溪二人都把龙场之悟作为阳明入关的关键，却都不曾提及阳明见甘泉及此前后阳明归于正学这一点。为什么他们把‘同质’之变看得重于‘异质’之变？就归本儒学而言，至少在丙寅（公元1506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然而，从整个阳明思想的历程来看，这个转变还不是最值得注意的。严格地说，他自己的思想尚未确立，他的全部困惑也并未最终解决，其中主要的障碍还是宋儒的‘格物’问题，这一问题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他。”^④陈来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其意义至少有如下两点：一是会甘泉于丙寅至道算不算阳明为学历程的重要一变？这个问题历来被忽略了。二是视丙寅至道为“异质”之变，“龙场悟道”为同，是从儒、道、释三教之大别而言，诚然无咎；但从阳明自身的学术进路而言，他心学体系的正式建构，龙场之悟则是此前任何一

变所不能与之并论的。本文于是循着这一思路，换一个视角，继续讨论阳明的为学历程。

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第1389页

二、龙场以前已有“四变”

除了“三变”，还有没有另外的提法呢？

《王文成公全书》中《年谱》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下面一段是《年谱》中关于阳明十八岁时的记述：

二年己酉（孝宗弘治，公元1489年。括弧内为引者注。下同。），先生十八岁，寓江西。

是年先生始慕圣学。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①

▲ 第一变，由“辞章之习”变至“始慕圣学”

这一年，阳明由“辞章之习”变至“始慕圣学”，应视为其为学历程的第一变。明初，几位稍有名气的儒学家，根据黄宗羲的看法，“认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是吴与弼、薛瑄及陈白沙。不过，这些人对当时哲学思想并无新的贡献。除白沙以外，其他都是朱熹思想的解释者”^②。其中包括阳明在广信拜见的老师娄谅。娄谅是吴与弼的学生。从王阳明思想发展行程看，与娄谅的会面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年谱》以“是年先生始慕圣学”为条头，显然具有某种象征和标志意义。作为学生的少年王阳明，在学业上的选择并无更大余地，虽然早于少时已泛滥于辞章，但并非不知作圣之事。阳明在少年时，“作圣贤”之理想和“契于圣学”之用功是不同时期的事情。先有“作圣贤”之理想，后有“契于圣学”之用功。在用功方面，阳明首选的途径是辞章之学，但他后来知道，朱熹是把自己的儒学与所谓“记诵”“辞章”相区别的。“在朱熹看来，以往的儒

① 李申：《简明儒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39页。
② 李申：《简明儒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39页。
③ 《年谱一》 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

学讲礼、讲孝，等等，但什么是礼、什么是孝，却并没有弄得清楚明白。在治国问题上‘礼意’和‘礼仪’之争，在尽孝问题上名教与自然之争，都是没弄明白的反映。”^①“汉代的儒学，在他们看来，只是记诵之学或者章句之学。这样的学问，就是没有弄清什么是礼、什么是孝。在认识上偏离了孔子的方向，在行动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儒者之道。”^②娄谅向阳明介绍朱熹的格物之学，并告之以“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铸成了阳明由“泛滥于辞章”向“始慕圣学”的最初一变。按蔡仁厚的说法，这是“异质之变”，同时又是本体之变，这本体之变中无疑又包含着功夫之变。之后，年轻的阳明，就开始追求儒家之道并试图找出宋儒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格物”一词的意义。《年谱》记述了十九岁时阳明刻苦用功于圣学以求“格物”之深蕴的感人事例：

（1490年）龙山公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讲习经义。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惜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③

▲ 第二变，因格竹不成，“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但仅仅两年之后，一桩“格竹求理”的荒唐之举，使阳明的为学之途又发生了变化。《年谱》载曰：

五年壬子（公元1492年），先生二十一岁，在越。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

贤有分^①，乃随世就辞章之学。^①

阳明在父亲花园中对着竹子凝神静思，希望发现竹子中所含
这是朱熹所讲的方法，朱熹认为天地万物皆含至理，通过
一事一物的“格”，便可发现。可是阳明连“格”七天，还是一无所
获而病倒了。阳明由此生出对格物之学的怀疑。如果说有什么
收获，那就是所谓“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此段活
动构成阳明为学历程上的第二变。这次变化并没有像王畿和梨洲
所说的那样，立马开始“出入于佛老”，而是又回到了辞章之习的老
路上。这一回头就是六年时间，不可谓短。

在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这期间，根据《年谱》的记载，阳明
回到以学习辞章艺能为主的旧途，这表明一个青年学子正徘徊
不定。他也曾希望从学子之业而一伸经国济民之志。他赴乡试落
第，能以“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以自安。不
过，他最终得进士及第并授命工部主事，也曾对边事饶有兴趣，
以至几番上书朝廷。

第三变，出入于佛老二氏

到了二十七岁这一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年谱》记载：
一年戊午（孝宗弘治，公元1498年），先生二十七岁，寓
京师。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
于天，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
“居静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
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浹，
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
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②

首次对朱子学说的怀疑，导致阳明思想发生两次变化。一次

是二十一岁时“格竹之举”的失败；一次是二十七岁时读朱子《上宋光宗疏》产生的迷茫。不知是不是巧合，阳明的这两次怀疑，恰好反映了他对朱熹关于“格物致知”二重解读的反思，这为他以后新思想的诞生埋下了伏笔。朱熹对“格物致知”有一套专门的解读，后为世儒所宗。其中关于“格物”的途径，朱熹主要讲了两条：一是通过读书以明义理；二是洒扫应对之接人待物。阳明正是老老实实照着这两条去做而产生迷惑的。照着“接物”一条而去格竹，照着“读书”一条而去“居敬”“循序”，结果均产生出“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的感受，更是“益委圣贤有分”。又恰逢有道士谈养生，便产生了“遗世入山”的想法。阳明二十七岁的这次变化，构成了其为学历程上的第三次变化。这是典型的“异质之变”。

在二十七到三十一岁期间，阳明的主要兴趣大概在佛教和道教。阳明一生与道、释二家的联系及受其影响，截至“龙场悟道”之前，《年谱》的记录至少有如下几个重点：

其一，成化十二年，阳明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语，更今名，即能言。”^①

其二，弘治元年，阳明十七岁，七月在洪都娶诸氏做老婆，“合巹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②。

其三，弘治十一年，阳明二十七岁，“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其四，弘治十四年，阳明三十岁。“遂游九华，……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旁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

人巴巴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①
其五，弘治十五年，阳明三十一岁。“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第二年，阳明因病来到杭州西湖休养，来往于南屏、虎跑等寺庙，“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惊起，即开视对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喻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

第 第
1392 1393
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宋明儒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程朱学派非常反对禅宗，但宋以后的学者很少有不与禅者与佛书接触的。王阳明自不例外，且更有甚者。自明以来，阳明之后的空谈心性之风，无不与此相关。

阳明三十一岁之后，开始了他为学历程中的又一次徘徊。这次徘徊是从对佛、道二家的怀疑开始的。

十有五年壬戌（公元1502年），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

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复命，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②

▲ 第四变，由泛滥各家到归本正学的转化期

直到弘治十八年，经过了长达三四年的怀疑和探索之后，阳明思想经历了由广涉各家到归本圣学的转化期，因结识湛甘泉而使其为学历程在截至龙场之前实现了第四变。

十有八年乙丑（公元1505年），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

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

① 《年谱》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一第1393-1394页。
②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③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第1605页。

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①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谈湛甘泉，以及湛甘泉与王阳明之间的一些联系。陈来先生说，《年谱》载：阳明与甘泉定交在乙丑（1505年），然甘泉每言定交于丙寅（1506年），当依甘泉之说^②。关于这个微小的差别，我们就不去讨论它了。

▲ 第五变，龙场悟道

阳明无可归依的个体心灵尘埃落定。

三、析甘泉“五溺”说

“五溺”之说见于湛甘泉为阳明所作的墓志铭：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二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指。^③

湛甘泉之前的明儒，无论是程朱理学的信从者还是陆九渊心学的追随者，都没有人想太平盛世不去入仕而甘居隐修以作圣人的。甘泉的老师陈献章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个为大家所赞许的“真儒”。他执意远离官场，独创了一套做圣人的静坐修身方法。陈献章的言行还影响了一大批学人，这些人不再从事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圣贤之学，而把隐居静修、成圣成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湛甘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湛甘泉提出的宗旨乃是“随处体认天理”。他发展并突破了他老师那套静坐的方法，要求随处，尤其在自己心中体认天理，这就离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仅一步之遥了。

① 从《年谱》多处记述可以看出陈献章与湛甘泉对阳明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梨洲《白沙传》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有而作圣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阳明）而始大。”^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四
甘泉先生年谱

从《年谱》多处记述可以看出陈献章与湛甘泉对阳明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梨洲《白沙传》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有而作圣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阳明）而始大。”^①

”^①

▲ 五溺之说不能成立

甘泉的“五溺之说”，有两点是应特别指出的：其一，任侠之习和骑射之习，说来均不能列入学术范畴；神仙之习与佛氏之习也只是上述多家所称之“出入于佛老”一事。无论是从《年谱》还是其他种种材料来看，阳明所涉佛、道二家均或同时或交叉，其中并无翻改。这样一来，所谓“五溺”所涉为学，就只有两变可立。其二，甘泉把时间提前了两年，自然就没有把“龙场悟道”包含进来，其凸现“丙寅定交”之目的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说来，从“辞章之习”到“出入于佛老”为第一变，再到“丙寅定交”为第二变，再加上“龙场悟道”，甘泉的论说仍为“三变”之论。可见，湛甘泉关于阳明为学的“五溺之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还可以看看阳明本人是如何说的。《朱子晚年定论序》云：

守仁早岁业举，溺于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越，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②

▲ “稍知”二字甚为精当

此为阳明自述其为学所经之阶段。从“溺于辞章之习”到“稍知从事正学”，是为第一变也。其中“稍知”二字甚为精当，刻画出了阳明于圣学认识的初级程度。无疑，这是符合一个十八岁青年的

认识水平的。阳明选择朱子之学，按当时的学术气氛，理所当然。而格竹受挫的原因则在于，年轻的阳明不知感性认识不足以达到事物之本质这个道理。

既是“稍知”，则往往面对各不同学派显得手足无措而“茫无可入”，于是转而“随世就辞章之学”，是为第二变。这个阶段，按阳明的说法就是：“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越，茫无可入。”

年轻的阳明计划从佛、道二家那里打通走向孔子的道路，于是就有“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此构成其为学历程之第三变。

以后的几年里，阳明的思想始终是徘徊不定的，“依违往返，且信且疑”。这当中自然包含与甘泉“丙寅定交”一段，第四变也就在其中了。

因此可以说，在龙场之前，阳明的为学历程就已经有了四次变化。

以“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的“龙场悟道”为最后一变，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不过，阳明在这段自述中始终没有提及“宋儒格物之学”，其后却有“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①一语，这是耐人寻味的。

四、“五变”说

王阳明的为学历程之论无疑应取“五变”说，即龙场前四变加龙场一变。“龙场悟道”是阳明思想宗旨确立的象征与标志，既是阳明为学历程的终点（广义地说，现代教育观念倡导终点学习，故无终身之谓），又是其为教历程的起点。将“龙场悟道”计算在其为

学历程之中，既是当然之理，又为世所公认。古者黄梨洲、钱德洪、王龙溪，皆有此论，今学者亦不例外，陈来先生《有无之境》一书对此有所专论。但陈来书中关于“早年历程”一节末尾的表述，尚存疑点。陈书原文如下^①：

王阳明先生岁举业，溺志辞章；既而从事宋儒循序格物之学，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若无所入；因求之老释，出入久之，恍若有会于心；后觉二氏之说终不可付之日用，于是归本于濂洛身心之学，允契于甘泉所谓自得之旨；然终未能释疑于向物求理之说，谪居龙场，再经忧患、澄默之余，始大悟圣门格致之旨，学问大旨自此立矣。

一方面，陈先生想要陈述的是“阳明龙场前的思想发展”情况，而实际说出来的却是到阳明龙场大悟为止的思想发展情况。这不能不说是陈先生一点小小的疏忽。另一方面，陈先生在以上陈述中用分号将阳明的思想发展剖分为五个时段，既然如此，五段之间就只应有四次变化，而陈先生却在末尾下了个结论说“故经五变而宗旨始真”^②，我想陈先生是把“段”当做“变”了。故陈先生所谓的“五变”实为“四变”。

故经五个时段即五次变化更为合乎实际

本书亦“揆之阳明及门人所述”^③，认为阳明的为学历程（含龙场悟道一段）应划分为六个时段、五次变化更合乎实际，即在陈先生所述“既而从事宋儒循序格物之学，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若无所入”与“因求之老释，出入久之，恍若有会于心”这两个时段之间，实际存在着一个所谓“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的阶段。这个阶段从阳明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长达六年，是阳明为学历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两端连接着两个不同

的变化，这两个变化是不能混同的。这个阶段从整个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除身心之学外儒学自身发展相对独立的一条道路。因此，从阳明为学的实际经历来看，这一时段可以跨越，但不能绕过。

